



乡村脊梁

做人如海，
因为海以大为壮；
有容乃大。
做事如山，
因为山以高为奇；
有峰则高。

付之棣
著

中国农业出版社



乡村皆梁

付文棣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中国农业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乡村脊梁/付之棣著. —北京: 中国农业出版社,
2009. 9

ISBN 978 - 7 - 109 - 13540 - 6

I. 乡… II. 付… III. 新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64257 号

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)

(邮政编码 100125)

责任编辑 常瑞娟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~~840mm~~ × ~~920mm~~ 1/16 印张: 16.25 插页: 4

字数: 200 千字 印数: 1~1 000 册

定价: 36.00 元

(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)



2007 年，在云南采访期间，作者与该省副省长高峰在交流情况



1996 年，作者与浙江省副省长王永明（右一）



2002 年，作者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司长王国庆在交谈



2000年，作者在主持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研讨会，右一为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，右二为农业部原副部长万宝瑞，右三为人民日报社秘书长张德修



2005年，作者与中国农业影视中心主任刘增胜（中）、农业部机关党委书记（右）孙中华在人民大会堂



作者与中国农业影视中心总编辑赵泽琨在商议报道



2004年，作者在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采访时与该村老书记吴仁宝合影



1999年，作者与中国旅游报社社长林山在浙江横店集团会议中心



2005年，作者与山东省昌邑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在交谈

2002年，作者采访花卉苗木基地



1999年，作者在云南省采访期间，特地回到瑞丽看望当年入党介绍人郭家毅老书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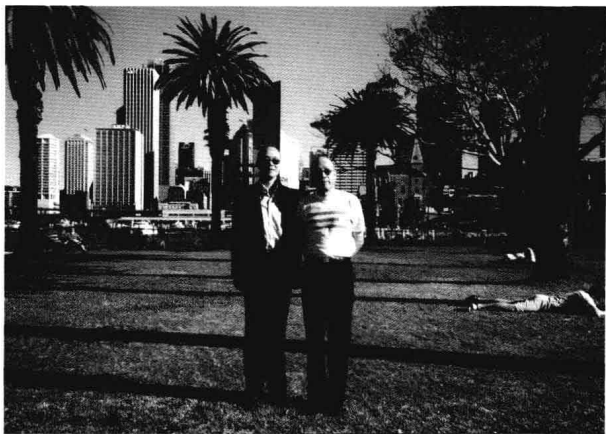


1998年，作者在北京平谷金海湖（右为韩凤桐）

2001 年，作者在新西兰



2001 年，作者在澳大利亚



1997 年，作者在法国

2000 年，作者与歌唱家腾格尔



2000 年，作者与全国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



1999 年，作者在缅甸



代序

老付这个人

刘震云



刘震云

1982年，我进农民日报，与付之榛办公桌相邻，后来，又办公桌对办公桌。我是新来的大学生，如何写新闻稿，如何编版，那时还是铅字排版，如何跑工厂，与排版的工人师傅打交道，老付对我帮助很大。

后来，老付当了部主任，我是该部的记者；老付当了副社长，我当了部主任、编委。一步步算下来，都是我的领导。我当编委的时候，陪他出去采访过几回。路上我提出的问题是，我身为编委，出门讲话，是否可以代表报社编辑部？他想了想说：“这个可以。”我又问，是否可以代表报社编委会？他想了想：“这个也可以。”我又问，是否一步到位，干脆代表报社得了，他想了想，看我一眼：“这个不可以。”

老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。如放到战争年代，可算生死之交了。就政治生命而言，可算领路人了。

以上是工作关系。在生活中，老付待我如兄长。我吃过老付包的饺子。两人在一起，也说过许多肺腑之言。



转眼二十七年过去了。老付一批，我一批，还有后来的一帮帮弟兄们，都把青春和汗水，洒到了《农民日报》的版面上。大家生命的最好时光，苦甜酸辣，都和报社相连。当年的小伙子大姑娘，大都两鬓斑白。大家与报社的感情，犹如一个人与故乡。

老付是满族人。魁梧。眼睛深度近视。摘下眼镜，能走路，认不清来来往往的人是谁。

老付面部轮廓分明。性格也分明，眼里不揉沙子。平日不大说话，发起火来，天不怕地不怕。当然，都是为了工作。说好听点，叫认真；不好听的，有点轴。

认真是干好一件事的前提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报社还没有实现自动化办公，写稿全在纸上。老付写稿，一字一句，皆笔划工整，页面不允许有改动之处。但稿子哪有不修改的？他的办法是，修改一处，这页必重新誊过。一样长的稿子，老付用纸量比别人大。

比认真更重要的是喜欢。老付从内心喜欢新闻，喜欢出去采访，喜欢写稿子，喜欢用报纸说话，他干记者就对了。

老付是老北京，当知青的时候，在云南插过队，从此喜欢上农村，他当《农民日报》的记者又对了。

比认真更重要的是见识。老付是个有见识的人。当记者，就得有见识。见识反应的是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。这个认识中，包括他目光的广度、长度和深度。见识嘛，识之前，得有见。老付懂这一点，也喜欢这一点，他长年累月在农村跑。不但为了新闻而喜欢，是喜欢这种生活方式。他喜欢田间地头、日出日落的感觉、气氛和气味。他喜欢与各个

阶层各色人等聊天拉家常。

记者不能太功利。老付的意思，先得是朋友，朋友的苦甜酸辣，想与你说，接着你想替他说，而不是通常的“抢新闻”。

这是大记者和小记者的区别。

比见识更重要的，是不同的见识。老付是个有不同见识的人。他善于从变化的世界和生活中发现不同的东西，他善于从相同的东西里发现不同，于是他能在大家熟视无睹的情况下，写出诸如《八百公里跟车记》、《路在何方》、《好好把握住这个“大门”——农民负担问题剖析》等引起强烈反响的文章。

当然，除了不同的见识，还要有不同的胆识。

除了以上这些，老付还喜欢写乡间的人物。说到写人物，就作者论，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写来写去，写的大都是与自己相近的人。物以类聚，惺惺相惜，在一个人的写作中，不可能不反映在文章中。老付过去写的人物，这回都聚集在这本《乡村脊梁》的集子里。如山东莱州的王书焕，如河南滑县的李连奇，如贵州的李桂莲，如山东掖县的张国增，如广东的钱龙飞……虽然他们生活的地方不同，性格不同，口音不同，高矮胖瘦也不同，但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敢于创新，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，敢于吃别人不敢吃的苦，敢于冒别人不敢冒的险。一句话，敢于走在生活和世俗的前边。不过，枪打出头鸟，要么，你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；要么，你被生活和世俗拍在了沙滩上。

但是，从古到今，从上到下，是这些人，推动着生活的



乡村脊梁

前行；他们，是民族的脊梁。是他们，不断带来一个地方、一个区域、一种生活，大到一个民族和世界的改变。

不但从古到今是这样，从中到外，也概莫能外。

老付喜欢这些人，喜欢与这些人交朋友，接着喜欢把他们写出来。

把这些人写得如此生动和深入，也就不奇怪了。

许多文章得过全国新闻奖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这些文章发表的时候，我大多从报纸上读过；这回通过这本书，重读这些文章，除了觉得亲切，又一次，受到这些人许多启发，受到老付许多启发。

相信每一个读这本书的朋友，会与我有相同的感受。

2009年5月5日

（刘震云系中国著名作家，曾创作《故乡面和花朵》、《手机》、《我叫刘跃进》和《一地鸡毛》等小说。）



出版感言

“垦荒”时节的回忆

付之棣

北京，据说有3 000多条胡同，大部分我都没去过。但有一条却在我的一生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。

这是北京东单附近的一条小巷：西总布胡同。

这是仄于小巷中间的一个院落：五十七号院。

对于农民日报来说，这就是她诞生的摇篮。

第一天报到

那天，办了报到手续后，我被领进了“摇篮”的西屋。起身相迎的是一个年龄与我相仿，身高也与我相仿，眼镜还与我相仿的小伙子：“我叫王克明，曾在延安插过队，你呢？”

“我叫付之棣，原在云南插队。”

“过去在报纸上写过东西吗？”

“写过诗歌，但没写过新闻。”

“我也写过点儿东西，也没搞过新闻。”

接下，就是互递作品，互相拜读起来。当时在西屋里的还有林菲（后来是报社科教部主任）、王凯（后来是全国农民报协会秘书长）、陈克立（后来是报社美术编辑）等几个



人。我是初来乍到，没敢左右攀谈，更没敢吸烟，那天往嘴里塞了整整一盒的戒烟糖。

第一回受训

报到后没两三天，有人把我叫进了“摇篮”的北屋，那是正房，领导的办公室。

苗培时（报社初创时的负责人）：“小付，你写过的东西我看了，到这儿工作文风必须要改！我们需要的是地地道道的乡土气息。”

“我会改，以后就把‘我’都改为‘俺’；把‘什么’都改成‘啥’。”

曦影（报社初创时另一负责人）：“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啊！我们追求的是当年太行老区的办报风格，不是改动个把字的事，而是要让农民喜闻乐见，是在思想感情上与农民息息相通。就说订报，农民没钱怎么办？拿鸡蛋、拿头发来顶替都行。”

现在回想起来，他们所倡导的，当然是指办报的思路，我觉得今天依然需要我们来秉承，可当时我不解其中滋味，心里只是一个劲儿地琢磨：倘若邮局收了那么多的鸡蛋、头发，可怎么办啊？

第一个老师

她叫丁紫，采访实习，都是她领着我跑丰台、跑房山。

丁紫爽朗，说起话明声亮嗓。丁紫也健谈，有她在就不会冷场。那时，单位里充满着和谐的气氛，和谐得连称呼都会变。

比如上班时我称丁紫为丁老师。因为早在1954年她就在北京日报当了记者，视为前辈，名副其实。下班后我又称她为丁阿姨。因为她曾告诉我，解放前她还就读于燕京大学时就结识了我的父亲。用她的话描述，那时家父一身白西服、一双白皮鞋、有烟没烟嘴里总叨着一根象牙烟嘴，表面上是以记者身份出现在校院，实际上是地下党，策动学生搞学运。

丁紫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启蒙老师。要说那些年，在农民日报这块田地里带着我学会春种秋收的人很多，象赵德新、孟冬、朱成、官伟勋、徐孔、黄实、莫廷良、洪卓民、王丰等，每个人都曾耳提面命，都传授过技能，但丁紫确是第一个。

第一次深造

八十年代初期的一天，我接通知来到北京朝阳区党校里的一间教室。路牌示意：这里是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。

第五期讲习所的学员有两类：一类是专业作家，像已在文坛显露锋芒的蒋子龙、孔捷生、王安忆、张抗抗等，我把他们称为“红花”类；另一类来自报刊，大都是业余的诗歌，散文爱好者，我称之为“绿叶”类。我呢，则掺杂在这



十几片“绿叶”当中，当属是近乎枯黄的一片。

一年的学习深造转瞬即逝（据说，那也是最后一期，多年后更名为鲁迅文学院了）。此后，在往来的电话中得知，“红花”们倍加浓艳，毕竟在文艺理论上有了升华。“绿叶”们的境况就参差不齐了，用他们的话说我，就是已经“凋谢”。的确，晚上还在构思诗作《洒落腮边的泪滴》，白天立马要转轨去报道《大牲口交易市场落成》，反差，碰撞，助成了我的取舍，从而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农民日报的耕耘之中。

不过，那一年的学习深造，对我从事新闻的写作当然是获益匪浅。

.....

在那个“垦荒”的时节，我有着许多关于“第一”的回忆。当时的同事肯定会有着更多关于“第一”的回忆。正是这一个个“第一”的合成，在媒体的原野上终于开垦出了第一张农民日报（初期叫中国农民报）。

以后的岁月是播种、浇水、施肥、除草……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今天，当这本《乡村脊梁》的样稿摆放在我面前时，我倏然感觉那近300页的样稿就像秋天收获的果实，尽管不算丰硕，更谈不上圆满，但在农民日报这块并不丰腴的土地上，自己在不知不觉中，“汗滴禾下土”竟也几近30年了。

如今的农民日报社已建起了高耸的办公大楼，已拥有了网站、印刷厂和几张子报。我敢说这是块极有耕耘价值的土地，我也确信同事们日后的收获比我强，会是囤满仓流。